

WENSHI ZHISHI

文史知识

谈谈我的治学经历

「苏李诗」和五言文人诗的起源

唐代天文数学家李淳风

春秋战国时期官制尊左尊右考辨

籍·贯·籍贯

近年来《西厢记》研究综述

牟润孙

曹道衡

门 蝉

姚国旺

王毓铨

周续赓

空军军医学校
图书资料
政治教研室

2

1988





医药学院610 2 01479272

文史知识

1988年第2期

(总第80期)

• 治学之道 • 谈谈我的治学经历	牟润孙	3
• 文学史百题 • “苏李诗”和五言文人诗的起源	曹道衡	8
• 历史百题 •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及相互影响	孙开泰	13
• 怎样读 • 封建社会的丧钟——读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	裴效维	20
诗 抒情与写实的完美结合——蔡琰《悲愤诗》赏析	谢 孟	26
文 《西厢记·圣药王》与苏东坡《春夜》	蒋星煜	30
欣 丑恶现实和美好理想的折射		
赏 ——读《聊斋志异·罗刹海市》	马瑞芳	33
• 古代科技史漫话(10) •		
汉代的代田法和区田法	范楚玉	36
文化 古代帝王的生日与祝寿	孙来臣	40
史 元宵为何张灯	孙永如	44
知识 明清瓷画中的吉祥纹饰	王 芳	48
• 文史书目答问 •		
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农业专著——《汜胜之书》	张习孔	52
• 金石丛话 • 十、摩崖	施蛰存	55
• 中国历代官制讲座(连载43) •		
清代官制(四)——仕途与官员任用(上)	王钟翰	58
人物 朝野称美“杜武库”	陶广峰	62
春秋 唐代天文数学家李淳风	门 蝉	68
秋 “人中之龙、文中之虎”陈亮	林蔚兰 徐传胜	73

绝代才人 薄命君王——南唐后主李煜新传(7) 田居俭 78

• 考古知识讲座(2) •

我国的石器时代考古 张江凯 85

• 文学人物画廊 •

前赴后继 终成大业——鲧禹治水(下) 屈育德 91

俗语 生老病死 禅 宿命

佛源 袈裟 清凉 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 95

春秋战国时期官制尊左尊右考辨 姚国旺 97

• 古代民族志 • 草原文化的创造者之一——敕勒族 吴 焜 102

烟台的近代民族工业 孙 峰 106

• 青年园地 •

千古是非心 一夕渔樵话——漫说元曲中的隐逸精神 朱万曙 109

• 文史信息 • 功利主义在中国古代的命运(72) 关于明末农民战争的讨论近况(111) 中国文人政治的形成(111) 古代吐蕃人的饮馔与服饰(112) 最古老的舞谱——八卦舞谱(112)

• 文史古迹 • 登州——古代中国的东方门户 朱亚非 113

• 文史信箱 • 籍·贯·籍贯 王毓铨 117

• 文史研究动态 •

近年来《西厢记》研究综述 周续庚 123

• 补白 7 则 • 真魅(12) 回煞(12) 慈禧与京剧(19) 清明时节雨纷纷(25) 不可辜君来意(51) 何畏鬼(67) 姜三莽捉鬼(84)

(封二)《西厢记》插图选

(封三)蓬莱阁

谈谈我的治学经历

牟润孙



牟润孙，原籍山东福山，1908年生于北京。曾从柯劭忞先生受经史之学。1929年考入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，1932年毕业。1948年任上海同济大学文史系教授、上海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。1949年任台湾省教育厅编审委员会委员，1950年任台湾大学教授，1954年任香港新亚书院文史系主任教授，新亚研究所导师兼图书馆长，1964年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、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。现任全国政协委员、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顾问。主要著作有《注史斋丛稿》等。

我和谭其骧、朱士嘉都是同学，珠玉在前，说出外行话，恐贻笑大方。

我先学的是文言，现在叫古汉语，念书是在当时的北京四中。小时候本来在家塾中读过，学了诸子、“四书”，还有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春秋》。后来到英国圣公会办的崇德中学，这个学校的毕业生不是进清华、就是进燕京，英文都挺好。我的英文也不坏，但因堂兄说念英文不容易进北大，而念法文容易进去，于是就到四中念法文，那时大家都以进北大为荣。我十二岁开始作文章，文章不见得好，当然能作通了。当时国文、英文、数学都还对付，如果是规规矩矩地念书，就可能念到理科去了。但到四中后，遇到一位叫石湘彦的老师，是保定莲池书院的学生，莲池书院属于桐城派。我受石老师的影响，不但在课堂上，还跑到他家中跟他补习。他让我先从清朝古文入手，倒着上

去容易学，把所谓桐城的“义法”也教给我了。但在十五岁那年，梁任公先生在《清华周刊》上发表了一篇《国学入门书目》，当时的《晨报》也转载了。我看了这篇《书目》后，觉得耳目一新。他所开的许多书目，我都闻所未闻，虽然我的石老师也讲了一些，譬如说，我跟石老师时，还没有顾颉刚先生《古史辨》的那一套，石先生曾让我念崔述的《考信录》，所以接触得并不晚，但就知道那么一点。结果一看梁先生的《国学入门书目》，原来天地还有这么大！眼界就开阔了。我又买了梁先生的《清代学术概论》，读后就非常崇信。这一部《清代学术概论》把我吸引上了，尤其是顾炎武的一套归纳方法。十六岁以后我就按目求书，梁任公在《东方杂志》所发表的《清代学者整理旧学总成绩》就成了指导我的索引，我就专门看那些书。我父亲在我十六岁那年冬天就去世了，所以也没人管我，我不管学校功课，任意去念中国古代这些书。找来《书目答问》，就往下钻研，结果数学、外文都渐渐差了，偏于一面发展了。中学毕业后，考北大没考上，就考进中法大学，念念没意思就不念了。那时有个俄文法政专门学校，我又进了这所学校，一面念俄文，一面念法律，念了不到一年也不念了，就专门照梁任公说的那些东西去学。他提到谈迁、张岱，一部《国榷》、一部《石匱书》，于是我就照着他学，还做过《谈迁著述考》、《张岱著述考》，另外还写了一些东西，有的刊登在燕京大学学生办的《国学专号》上。

二十二岁那年赶上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招生，招大学生是正式的，如有论文和著述，审查合格也可招收特别研究生，开始我没有勇气，最后还是四中同学吴祖光的堂兄吴祖刚，劝我报考，并把我的著作寄到燕京大学，没想到居然叫我去面试。面试我的人就是陈垣先生，他见了我后，首先问我师承，我说没有。他说：“那你怎么作起这些东西？”我说我就念了梁任公的书，就跟着任公先生的路子走。“那有人指导你没有呢？”我说没有。他又问我，你们家里到底有谁可以指导你呢？我说修《新元史》的柯劭忞先生是我的长亲，有时候我可以问他。

的确我可以说是自学的。但是，那时年轻，关键是古汉语知识搞得扎实，做好，做通，让人一看呢，能说得明白。后来又受梁启超先生影响，写了这点东西，虽然没有师承，但还不至于过分荒唐。承陈

老师的谬赏，就把我收进来了。进了燕大国学研究所，所长就是陈垣先生，导师有好多位。当时把我分到了顾颉刚先生手下，颉刚先生也很赏识我，但是我对他的《古史辨》并不十分赞成。颉刚先生给我出了一个没法儿作的题目《清代禁书考》。我去哪儿找这些禁书呢？很难，我没法作，我也不习惯他的这种指导方法。他对于后学，经常是“你这篇文章好，我给你发表。”而陈垣老不同，陈垣教学生是：“你不要胡写啊，小时候乱作，老了要后悔的。不能乱写文章啊！”两位老师完全不一样。顾先生给我定这题目，陈垣老是所长，也对我说这材料很难办，我领你到故宫看，故宫有人搞，一位是单士元，一位姓刘的，他们那儿有材料，但他们不肯给你，你去那儿看看得了。当然人家是不肯给我了，我也就没有作。后来陈垣老说：“我给你出个题目。”就是研究入居中国的外国人的蕃姓，所谓梵姓，比如诗人白居易，是西域龟兹国的人；再如李光弼是契丹人。让我搜集这些，作《蕃姓考》，结果我的论文是陈垣老指导的。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挺荒唐的，因为人家有制度，有导师，怎么能撇开导师而直接由所长指导呢？后来毕业后，又做了一件荒唐事，颉刚先生让我把欧阳修辨伪的话抄出来，可以作一本《欧阳修辨伪集语》，我就抄了。颉刚先生说这可以出版，而我不想出版。颉刚先生问我为什么，我说现在兴趣改变了。这不是很荒唐吗？白寿彝就比我高明了，他抄成了《朱子辨伪》，结果顾先生就给他出版了。当时，我觉得对伪书不能一概而论，比如阎若璩费了老大力气，辨伪《古文尚书》，差不多也可以成为定案吧！但是，能说伪《古文尚书》完全是王肃虚造吗？其中有真材料，它是东晋不晓得什么人，对所见“古文尚书”的材料，不懂得采用像宋人那种辑佚书的办法，一条一条辑，不连缀也不要紧。但他不，他想把它连起来，恐怕其中还有翻译，于是“艺术加工”成为一个整篇的文章，所以别人认为这是假的。实际上《古文尚书》，现在有许多人发现其中有真的。所以，我觉得像欧阳修那样的“辨伪”做得有些过分。

当时我较喜欢陈垣先生的治学方法，他很严格，引书必引第一手材料，如研究两汉，你不引两《汉书》，而引《资治通鉴》，他就会问：为什么引《通鉴》？有位同学就曾引了《通鉴》，陈垣老就问他为什么不

引原书？同学回答说：“我没有功夫。”垣老说：“什么事情在后面催着你？”丝毫不客气。这严格的训练，使我受益匪浅。我从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出来后，陈垣老说：“你二十四岁，学生都比你大，你去教中学吧。”他叫我去中学教国文，我教了四年国文，甚有好处。从前自己念书，有时囫圇吞枣，字未必念得清楚，音也未必念得准确；教书就不能这样。我现在念书，仍不敢马虎，那都是得之于垣老之教。

除受陈垣老的影响外，我还有一位老师，那就是柯劭忞先生，柯先生长我两辈，是我亲戚。他八十二岁还找了几个学生讲经学。我父亲过世后，他对我们很照顾。开始他不知道我念书的情况，等我进了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，陈先生曾对着柯先生的儿子夸奖我。柯先生听说后就收我做学生了。柯先生可以说是清末民初第一人，王国维先生很佩服他，他的传世之作是《新元史》，而《新元史》并不是他最好的著作，因为里面许多外国材料，对音有时对错了，别人攻击他。而他对经、史、小学、音韵、训诂、算学、历法无一不精，写出来的东西却很少。他活了八十四岁，我在他八十二岁时从他学习，距今有五十多年了。他讲学，一两句话点到即止。比如我说念历史是不是章学诚《文史通义》好，他说：不对，全说错了。但原因何在，他没讲。我又不敢问他，到三十几岁时，通过读书，逐渐知道，章学诚的确是有多地方错了。又如他开宗明义说：讲宋人之理学、清人之考据，不能跟阮元走，阮元全错了。后来傅斯年做考证指出，“训诂明则义理明”这句话根本有毛病，若此你能说把《说文》、《尔雅》读通了，你就懂哲学了？哪有这事情！所以，我得到柯先生益处，就往往是这一两句话，得陈老的益处也是如此。那时读研究生不要上课，我是常常到陈老家中去请教，陈老说什么我就回去念什么书。我的这一点儿成就都是因为拜陈垣老、柯老为师得来的，除此，我当推陈寅恪先生，当年也是陈垣先生介绍：这位先生学问可是了不得，你得注意。因此，陈寅老发表什么东西，我全都细念，甚至，陈寅老给清华大学出对子后，写的那封给刘文典的信，我都能背下来。寅老审查冯友兰《中国哲学史》报告，我也念得很熟。的确，我对寅老十分崇拜。

现在的青年学生，比我的条件恐怕差一点，比如我们当初拿一本

书，拿一本《四库提要》的简明标注，就可以到玻璃厂访书，或到图书馆去找，现在恐怕就不大方便了。当初我们却是方便得很，我们一买书，那时书也便宜，头一部就是《日知录》，第二部《潜研堂全集》。这一辈子，对这两部书翻来覆去老念。比现在大概还容易吧，做学问有时非找图书馆借来不可，图书馆有期限哪，比如有时候念书，半夜里想起一个问题来，就马上起来找这书。我现在在香港，三间房子全是书，书还没地方摆。有问题马上就得翻书。但我感到痛苦的还是书太少了，没法多翻。有的书必须精读，如《日知录》、《潜研堂全集》、《通鉴》、《左传》、《三国志》，还有几部经书、史书，非翻来覆去地读不可。有的书，我是翻的，那你不能不翻。如果要翻，非得到图书馆去找，那也不行，临时要查一个问题，等走到图书馆，灵感也没了。

我跟启功、周祖谟、台静农都是辅仁大学同事，教大学一年级国文，大一国文由校长陈垣先生亲自管。考试，由校长出题，那不是考学生，而是考教员。台湾也是这样，校长傅斯年自己管大一国文，自己选教材，也是自己出题考。这样逼着我们对于书弄得很清楚，如《史记·留侯列传》里说：“毒药苦口利于病，忠言逆耳利于行。”现在呢，后一句没有改，第一句改成“良药苦口”，因为大家想，若是毒药不把人害死了吗？于是就改了。而实际不对，我特地写了一篇文章，探求“毒”字。毒，当辣讲，刺激着嘴难受，并非毒。我用了《国语》、《周礼》、《方言》证明这个问题，“毒”是厉害的药，辣的药，就是“烈”。这地方如果囫圇吞枣，不求甚解，管他毒药、良药念下去，似乎也可以，但我们教国文，就得弄清楚。再如《史记·淮阴侯列传》有一句“奉项婴头而窜”，奉，捧；项，脖子；婴，环绕。结果现在标点本把“项婴”划一人名线当成人名。可是到哪儿找这个人呢？诸如此类，不细读，就不行。这是基本功，当时垣老对我们的训练很严格，一字不差。

片片断断，讲了这许多，或许能给有志于文史的青年朋友一点启发罢。

（本文据录音整理，未经本人阅过）

“苏李诗”和五言文人诗的起源

· 文学史百题 ·

曹道衡

在我国古代的诗歌中，五言诗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。从汉末的建安时代直到唐初，几乎所有的诗人，都以擅长五言诗为主。即使到唐宋以后，七言诗的地位显然提高，五言诗也并未衰歇。然而，五言诗这种体裁究竟兴起于何时？却是历来研究者聚讼纷纭的问题。

一般来说，这种诗体在西汉时代已在民歌中流行，如《汉书·五行志》所载成帝时民谣“邪径败良田”；《贡禹传》所载民谣“何以孝悌为”及《酷吏传》所载民谣“安所求子死”等，均系民歌。这说明最晚到西汉中期以后，这种诗体已经出现。但是这些民谣恐怕还不能算最早的五言诗。因为在《汉书·外戚传》中有一首李延年的《李夫人歌》也全属五言。此诗作者本是朝廷的乐官（协律都尉），既非著名文人，也不是一般百姓。他创作这首歌时，很可能采用了当时民歌的形式，所以说五言诗的形式，应该出现于汉武帝以前。事实上现存的史料中，确有一些更早的五言诗，如：唐张守节《史记正义》在《项羽本纪》中引项羽的宠姬虞美人《和项王歌》：

汉兵已略地，四方楚歌声。大王意气尽，贱妾何乐生。

又：《汉书·外戚传》引汉高祖姬戚夫人所作《春歌》：

子为王，母为虏。终日春薄暮，常与死为伍。相离三千里，当谁使告汝。

这两首诗中，前者是纯粹的五言，后者则首二句为三言。历来学者对前一首曾持怀疑态度，对后者则似乎并无异议。不过，人们对前一首的怀疑，主要就因为它是五言体，与项羽所作的《垓下歌》文体不同。这看法亦难视为定论。因为虞美人和戚夫人两人时代相去甚近，而戚夫人之作既无可疑，而其体又基本上属于五言，那就很难说虞美人之作出于伪托。何况《楚汉春秋》是汉初陆贾所作，其书著录于《隋书·经籍志》，说明唐代尚存，更难说此诗必不可信。所以说五言民歌的

兴起，恐怕最晚也得在汉初以前。

然而虞美人、戚夫人和李延年之诗，都属口头创作，古代评论家们并不把他们当作文人看待。所以像刘勰在《文心雕龙·明诗》中讲到五言诗时说：“至成帝品录，三百余篇，朝章国采，亦云周备；而辞人遗翰，莫见五言，所以李陵、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。”钟嵘《诗品》序则云：“逮汉李陵，始著五言之目。古诗眇邈，人代难评，推其文体，固是炎汉之制，非衰周之唱也。自王杨枚马之徒，辞赋竞爽，而吟诵靡闻。从李都尉迄班婕妤，将百年间，有妇人焉，一人而已。”根据刘勰、钟嵘的话，似乎文人之作五言诗，始于汉代的李陵和班婕妤。然而两人的意见不尽相同。刘勰对李、班之作，似在半信半疑之间。另外，他在《明诗》中又说：“又古诗佳丽，或称枚叔，其《孤竹》一篇，则傅毅之词，比采而推，两汉之作乎？”在这里，又提到了现存于《文选》中的《古诗十九首》里，有枚乘的作品，枚乘生活于汉朝文、景时代，至武帝初便死去，比李陵又早了几十年。尽管刘勰对那些号称枚乘所作的古诗也是疑信参半，而在南朝，恐怕确有此说。所以稍后的徐陵，在编《玉台新咏》时，就把九首古诗归到枚乘名下（其中“兰若生春阳”一首，不在《古诗十九首》中）。此外，在梁代萧统所编的《文选》和徐陵编的《玉台新咏》中又出现了所谓苏武的作品。这不但是刘勰、钟嵘所没有提到的，而且根据钟嵘的话，还可以认为他不承认苏武诗的存在。不过钟嵘所信以为真的“李陵诗”，在他以前就早有人认为是伪作。如刘宋颜延之《庭诰》：“逮李陵众作，总杂不类，元是假托，非尽陵制。”颜延之的时代较刘勰、钟嵘为早。钟嵘和稍后的萧统、徐陵对颜延之、刘勰的文章，不应该不知道。但颜延之说“非尽陵制”，刘勰说“见疑于后代”，都非肯定的语气。所以萧统等人仍然题作“李陵诗”或“苏武诗”，恐怕也只是以疑传疑。此后在一段时期内的文人和学者，大抵信从《文选》、《玉台新咏》，以“苏李诗”为真。唐刘知几《史通·杂说下》曾怀疑所谓李陵《答苏武书》“观其文体不类西汉人，殆后来所为，假称陵作也”。但并未怀疑李陵的诗。宋代的苏轼，却又对“苏李诗”的真伪提出疑问。他说：

李陵、苏武赠别长安而诗有“江汉”之语。及陵与武书，词句

儇浅，正齐、梁间小儿所拟作，决非西汉文，而（萧）统不悟。苏轼提到所谓“苏武诗”中“俯观江汉流”一语，认定不是苏、李在长安赠别之作的口气，这很有见地。但说是齐、梁人伪作，却难以成立。因为颜延之卒于宋孝武帝孝建三年。他已提到李陵诗：江淹在刘宋时作《诣建平王上书》，有“此少卿所以仰天槌心，泣尽而继之以血也”语，用的是所谓李陵《与苏武书》中典故。可见不论“李陵诗”或《答苏武书》，在南朝宋时已流行，并非出于齐梁人之手。

苏轼在我国文学史上地位极高，影响甚大。自从他对“苏李诗”提出怀疑之后，许多人就不断提出疑点。如南宋洪迈在《容斋随笔》中，又提到了“李陵诗”中有“独有盈觞酒”句，“盈”字乃汉惠帝之名，为西汉人所当讳，因此断言李诗是伪。后来清初顾炎武在《日知录》中也从洪说，又提到《古文苑》中枚乘《柳赋》有“盈玉缥之清酒”句：《玉台新咏》所载枚乘诗有“盈盈一水间”语，认为均非西汉人语。顾氏的话，比洪氏更进了一步，因为既然“苏李诗”有“盈”字非西汉人作，那末枚乘诗中也有“盈”字，当亦非西汉人作。这样一来，西汉文人的五言诗，都成了可疑之作。这种用避讳来考定真伪的说法，看来很有力，然而仔细推敲起来，也未必能成为定论。因为古代皇帝的名字，虽然按理应予避讳，但事实上总有不少例外。即以汉代而论，避文帝名“恒”字，改为“常”，因此把“恒山”叫“常山”；把“姁娥”改为“嫦娥”。但《淮南子》中提到“嫦娥”，偏偏作“姁娥”。据《汉书·淮南衡山济北王传》，《淮南子》一书是曾献给汉武帝看的。文帝是武帝的祖父，《淮南子》的作者也并不讳。再说洪氏和顾氏认为西汉人必须避惠帝的名讳，那么东汉人该不该避讳呢？如果说东汉人因为世代久远，对惠帝的名字可以不避讳的话，汉高祖是汉代的开国皇帝，对汉高祖的名字总得避讳，该不成问题的了。但曹操的《气出唱》中却有“行四海外，路下之八邦”句。曹操虽有“魏武帝”的谥号，生前毕竟是汉朝的官员，又何以触犯刘邦之名？再说历代帝王及其祖先之名，总是要避讳的。如唐代因高祖的祖父名虎，所以唐人照例讳“虎”字，而唐诗中“虎”字却数见不鲜。所以仅据一个“盈”字就断定这些诗非西汉人作，恐怕尚嫌证据不足。另外，相传的“苏李诗”，究竟是苏武出使时李陵在长安送别

还是苏武归汉时李陵在匈奴送别，历来也有不同的看法。如果是李陵降匈奴以后送苏武归汉，那就更没有避讳的必要了。

除了洪迈、顾炎武从避讳的角度论证“苏李诗”是伪作外，清代钱大昕又从文体的角度来判断“苏李诗”与“枚乘诗”为伪作。他在《十驾斋养新录》中说：

观《汉书·李陵传》置酒起舞作歌，初非五言，则知河梁唱和，出于后人依托，不待“盈觞”之语触犯汉讳始决其作伪也。枚叔又在苏、李之前，班史不言有五言诗，其为臆说，毋庸置辨矣。

钱大昕的说法，主要从文体着眼，他举出了《汉书·李陵传》中李陵别苏武时的歌是楚歌而非五言，又认为枚乘诗不见《汉书》，这显然也有一定的道理。但是此说恐亦难为定论。因为同一作者能作“楚歌体”的诗，并不一定不能作五言诗。至于“枚乘诗”不见《汉书》，这只是“默证”。据此论定枚乘诗是伪，不免证据不足。因为历来文人的诗文，不载于史传的很多，不能都因此断为后人依托。

关于“苏李诗”的真伪问题，到近人梁启超的《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》中，更是集诸说之大成。在梁启超看来，“苏李诗”应该是汉末建安时的产物，并且认为相传的李陵诗出现较早，苏武诗则稍晚，“但最迟也不过魏晋间作品罢了”。梁说较之前人稍为精密，他既没有纠缠于避讳问题，也不说是齐梁人伪托。只是认定这种诗体不能出现于西汉。现代的研究者，大抵都从此说。

平心论之，梁启超的看法，其实是建立在一种假设上的，即：相传为西汉文人所作的五言诗，都不可信。但这个假设至少不能算定论。因为除了“苏李诗”外，还有相传的“枚乘诗”。《玉台新咏》中所录九首“枚乘诗”，有八首在《文选》中列入《古诗十九首》里。《古诗十九首》并非一个整体，不能因为其中有一首提到“游戏宛与洛”，就认为一定全出东汉。（即使出于东汉，也不定必是汉末。）这九首诗，从刘勰、钟嵘和萧统看来，似都不认为是枚乘作。然而我们现在所能证明那九首“枚乘诗”出于假托的证据，仅仅在“盈盈一水间”和“盈盈楼上女”两句，而仅凭一个“盈”字即断定非西汉人的说法并不能视作定论，

已如上述。于是就形成了这样的局面：认定“枚乘诗”和“苏李诗”是伪作的根据在于其诗体不似西汉；判定西汉不能产生这种诗体的前提又是相传的“枚乘诗”、“苏李诗”乃后人伪托。这种论证方法至少在逻辑方面是不够严密的。

在目前的条件下，由于史料缺乏，对“苏李诗”的真伪和五言文人诗的起源还很难得出肯定的判断，只能依据刘勰等人的成说，认为“苏李诗”在南朝已有人怀疑，文人之作五言诗，始于两汉——究竟始于西汉还是东汉，也难断言。至于确切的结论，还有待于新史料的发现。

真 魅

有马氏者，家忽见变异，夜中或抛掷瓦石，或鬼声呜呜，或无人处突火出，翫（niǎo，戏弄，纠缠）岁余不止，禱禳亦无验；乃买宅迁居。有赁居者翫如故，不久亦他徙（搬到别处）。以是无人敢再问。有老儒不信其事，以贱价得之；卜日迁居，竟寂然无他。颇谓其德能胜妖。既而有猾盗登门与诟争，始知宅之变异皆老儒賄盗夜为之，非真魅（鬼怪）也！先姚安公曰：“魅亦不过变幻耳。老儒之变幻如是，即谓之真魅可矣。”

纪昀《阅微草堂笔记·
滦阳消夏录（三）》

回 煞

表叔王碧伯妻丧，术者（算卦的人）言某日子刻回煞（死者灵魂回家）。全家皆避出。有盗伪为煞神（回煞的鬼魂），逾垣入，方开篋（小箱子）攫簪珥（抓取首饰）；适（正好）一盗又伪为煞神来，鬼声呜呜渐近。前盗惶遽避出，相遇于庭，彼此以为真煞神，皆悸而失魂，对仆于地。黎明，家人哭入，突见之，大骇；谛视（仔细一看）之，乃知为盗。以姜汤灌苏，即以鬼装缚送官，沿路聚观，莫不绝倒。

纪昀《阅微草堂笔记·
滦阳消夏录（五）》

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，呈现出群星灿烂、盛况空前的局面，是我国古代史上光辉的一页。研究这一段丰富多彩的历史，是很有意义的。

一、何谓诸子百家

春秋是我国奴隶制瓦解和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，战国是封建社会的开端。春秋战国经历着剧烈的社会变革，阶级关系有很大的变动。春秋中后期，随着奴隶制的破坏，新的封建生产关系开始产生，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逐渐形成。到战国时期，这两个阶级便构成了封建社会的两个对抗阶级。但奴隶主阶级还存在，大量官私奴隶也仍然存在。个体手工业者和商人在城镇有相当大的数量。伴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，过去的“官学”变成了私学，有知识有学问的人多起来。他们分属各阶级各阶层，以“士”的身份出现，对于天文、地理、数学等各种学术问题争论不休，对于政治制度，更是各有主张。形成了“诸子百家”和“百家争鸣”。

“诸子”，是指春秋战国时期思想领域内反映各阶级、阶层利益的思想家及其著作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说：“诸子百八十九家”，取其成数叫“诸子百家”。主要的有老子、孔子、墨子、杨朱、许行、商鞅、申不害、孟子、荀子、庄子、韩非子、惠施、公孙龙、田骈、慎到、宋钘、尹文、关尹、邹衍、张仪、苏秦、吕不韦、孙武、吴起、孙臆、尉繚等。

对“诸子百家”，战国时期的《孟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荀子》、《韩非子》、《吕氏春秋》等书中都有记载。古代的历史学家，如西汉初期的司马谈认为，“诸子百家”主要是指“阴阳”、“儒”、“墨”、“法”、“名”、“道”六家。西汉末年的刘歆和东汉的班固则认为主要是指：“儒”、“道”、“阴阳”、“法”、“名”、“墨”、“纵横”、“杂”、“农”、

“小说”十家。有时又略去“小说家”，认为“其可观者九家而已”。

应该指出，所谓“六家”、“十家”或“九家”这些划分并不全面。比如，在孟子看来，杨朱学派在当时学术界的影响不小，与墨家常常相提并论。杨朱与老子、庄子很不相同，所代表的阶级立场更不一样，并非道家，应是独立的一家。按“六家”或“十家”之说，根本容纳不了。后来研究先秦思想史或哲学史的学者，往往按“六家”或“十家”的框框来套，因而把杨朱归入道家，甚至说成是道家的始祖，这是不合适的。还有，兵家在战争频繁的春秋战国时期占有重要的地位，在《吕氏春秋》里早就提到兵家孙臧。他们对后世的军事史和哲学史都有一定的影响。而“六家”或“十家”中都没有兵家，这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。我们应该把兵家单独列为一家人。

还应该指出，一家之中，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，他们之中有代表性的思想家，相互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别。如孔子死后，“儒分为八”。战国时期重要的儒家学派，就分为孟、荀两家。这两家，也都不是简单地继承孔子，而是各有发展。孟子把孔子的“仁”发展为“仁政”，孔子只讲“仁”，孟子则把“仁”与“义”并提。荀子则在儒学中增添了更多的内容。可见，同为儒家，差异却很大。道家中也有类似情况，稷下学宫的宋钘、尹文之思想和老子、庄子的思想，就颇多不同。如果以对哲学的基本问题，即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的不同回答作标准来分析“诸子百家”，就会发现：同属一“家”的人，在哲学上却往往分属不同的哲学阵营；而分属两“家”的思想家，有的在哲学上却属同一阵营。如孟子和荀子同是儒家，孟子哲学是主观唯心主义的，而荀子哲学则是唯物主义的。老、庄与稷下学宫的宋钘、尹文同属道家，但老庄哲学是唯心主义的，而宋钘、尹文的哲学则可以说是唯物主义的。

虽然如此，司马谈、刘歆、班固等从每一“家”的主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关系来分类的做法，给先秦思想家的划分标准和先秦思想史的研究工作，还是提供了重要的依据，所以它被后世一直沿用下来。

二、百家争鸣的盛况

春秋战国时期，新兴地主阶级在各诸侯国都把主要精力用于政治、

经济、军事方面的改革，致使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落后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其他方面。由于地主阶级的思想还没能成为统治思想，这就为“百家争鸣”创造了条件。使春秋战国时期各阶级的思想家，都能够自由地著书立说和四处奔走，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。

战国时期，各诸侯除了在经济、军事等方面加强自己的实力外，为逐鹿中原，十分需要借重知识分子，因而“养士”之风盛行。战国初期，魏文侯尊贤礼士，在他周围有一大批知识分子，如子夏、田子方、段干木、李悝、吴起、西门豹、乐羊等。他们对魏国的强大起了很大的作用。齐威王、宣王时在都城临淄的西门外设稷下学宫，招徕天下文人学士，在那里讲学和著书立说。“稷下先生千有余人”，《盐铁论·论儒》而稷下“学士”有“数百千人”。《史记·田敬仲完世家》后来的大贵族“四公子”孟尝君、信陵君、平原君、春申君“养士”多达几千人。战国诸侯、贵族的“养士”之风显然对“百家争鸣”起了促进作用。

战国诸侯对“士”往往采取宽容的政策，允许学术自由。他们虽然有所偏重和选择，但对各家的学术兼容并蓄。齐国的稷下学宫就是这样，田齐政权倡导黄老之学，但对各家各派的学者并不排挤打击，而是兼而礼之，允许其自由讲学、著书立说和议论政事。这是因为战国诸侯为了巩固其政权，要从多方面去总结政治得失，摸索统治经验，因此对各家各派“兼而礼之”。《淮南子·汜论训》说：“百家殊业，兼务于治”。可见百家学说，对于当时的统治者来说，都可以进行选择，各取所需。由于战国诸侯对“士”的宽容政策，允许其“合者留，不合则去”，从而促进了各国的人才流动。这也为“百家争鸣”创造了良好的环境。

在学术自由的环境中，培养了冲破旧传统思想的束缚、敢于探求的精神，从而大大促进了学术的发展。因此，各家各派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。各种观点纷然并存，直接交锋。各种针锋相对的辩论时有发生。“诸子百家”存在着极为错综复杂的关系。

在“百家争鸣”过程中，有儒、墨之争，儒、法之争，儒、道之争，

等等，就是在一家之中，内部也有不同派别的争论。诸子都从自己的立场出发，提出救世的主张。正如《淮南子·要略》说：“诸子之学皆出于救时之弊”。这样就形成了各家各派的特色。如《尸子·广泽》所说：“墨子贵兼，孔子贵公，皇子贵衷，田子贵均，列子贵虚，料子贵别固”。又如《吕氏春秋·不二》说：“老聃贵柔，孔子贵仁，墨翟贵廉，关尹贵清，子列子贵虚，陈骈贵齐，阳生贵己，孙臧贵势，王廖贵先，儿良贵后”。诸子虽各有特点，但他们往往各执一端，有其片面性。荀子曾批评当时各家自以为是：“私其所积，唯恐闻其恶也；倚其所私以观异术，唯恐闻其美也”。（《荀子·解蔽》）这种情况，恐怕也是难免的。

在春秋战国的意识形态领域里，虽然纷纭淆乱，但各个阶段仍有其斗争的中心问题。在春秋末期，主要是儒、墨显学的对立和斗争。在战国早、中期，则出现了儒、墨（翟）、杨（朱）三家鼎立的局面。战国早期，在齐国稷下学宫，黄老之学有颇大的发展，到战国中期比孟子稍晚的庄子，又发展了老子的学说，使道家有了较大的起色。而早期法家李悝、吴起、商鞅等，主要在政治经济领域从事变法改革，他们对儒家的思想斗争，其理论并不完整，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所占的地位也不十分重要。因此，孟子主要论辩的对手是杨、墨两家。到了战国后期，韩非总结了商鞅的“法”、申不害的“术”、慎到的“势”，才使法家的理论趋于完善。法家对儒家比较系统的批判是从韩非开始的。

从总的方面说，春秋战国“百家争鸣”的局面是剧烈的社会变革与阶级变动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。

三、诸子百家的相互影响

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，相互诘难，进行了激烈的论争，但这只是“百家争鸣”的一个方面，在争鸣的过程中，各家还有相互影响的一方面。过去学术界对“百家争鸣”互相诘难的一面比较重视，而争鸣中的相互影响的一面则往往被忽略了。

“百家争鸣”过程中的相互影响，在稷下学宫表现得十分明显。我